

没有硝烟 的 战争

MEIYOU XIAOYAN
DE ZHANZHENG

—— 抗战时期的 中日经济战

齐春风 著

与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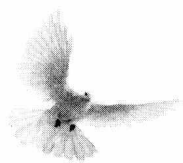
江苏省重点学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科资助项目

没有硝烟 的战争

MEIYOU XIAOYAN
DE ZHANZHENG

——抗战时期的 中日经济战

齐春风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没有硝烟的战争——抗战时期的中日经济战 / 齐春风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648 - 2204 - 0

I. ①没… II. ①齐… III. ①经济争夺—研究—中国、日本—1937 ~ 1945 IV. ①F129.6②F131.3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3911 号

没有硝烟的战争——抗战时期的中日经济战

齐春风 著

◇策划组稿: 刘苏华

◇责任编辑: 刘苏华

◇责任校对: 蔡 晨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73070 88873071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19 千字

◇版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2204 - 0

◇定价: 35.80 元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对华经济战	(11)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对华金融战	(11)
一、日方对货币战的重视	(12)
二、伪银行的设立	(13)
三、贬值和取缔法币	(15)
四、发行军票	(19)
五、统制外汇	(21)
六、伪造法币	(24)
七、套取法币	(26)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对华物资战	(32)
一、日军封锁政策的确立	(32)
二、日军的封锁作战	(46)
三、日本与第三国交涉封锁中国	(50)
四、日本的经济封锁	(55)
五、日本的物资掠夺	(70)
六、走私与封锁的交替使用	(76)
第二章 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战	(82)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	(82)
一、贸易机构的调整	(82)
二、对敌经济斗争法令的颁布	(84)
三、对日经济封锁政策的调整	(102)
四、查缉封锁机构的演变	(109)

五、对敌经济斗争机关的设立	(118)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的对日金融战	(128)
一、外汇战	(128)
二、货币战	(137)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的对华经济战	(148)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的对华金融战	(148)
一、全面禁用、回收法币	(148)
二、将法币逐回大后方	(153)
三、继续伪造法币	(157)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后日本的对华物资战	(158)
一、日伪封锁的继续推进	(158)
二、日伪的物资统制与掠夺	(169)
三、吸收大后方物资	(183)
第四章 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战	(192)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的对日金融战	(192)
一、限制法币内流	(192)
二、伪造沦陷区货币	(201)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	(202)
一、物资管制的强化	(203)
二、缉私与封锁的调整	(207)
三、抢购政策的确定	(214)
四、货运管理局的抢购活动	(223)
结论	(236)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77)

绪论

一、选题动机与研究现状

抗战时期，中日双方在军事战场上进行激烈较量的同时，还在经济战场上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经济战中，日本处在进攻的地位，其意图是摧毁中国的抗战经济体系，使中国无力继续抗战，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国民政府则处于应战的地位，采取措施反击日本的经济侵略，以保持抗战的经济力量。中日经济战实际上是一种敌对的、双边的、互动的经济活动，双方的经济策略表现出相当密切的针对性和关联性。这些经济策略对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产生了重大和复杂的影响，学界一般将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视为物资层面的物资战。^①然而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实际上，这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关系除了包括用“走私”来界定并不尽确切的物资战以外，还应该包括在两地区间进行的金融战。这两者是互相交织、互为表里的。本书即从金融战和物资战的关系入手，对抗战时期各阶段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战的发展演变及其影响做一些分析。

经济战在中日战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抗战之初，日人木村禧八郎在《论“华北的货币战”》一文中认为，中日战争具有特殊性。经济战是比武力

^① 简笙簧：《抗战中期的走私问题（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1期，1979年5月；Lloyd E. Eastman, “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75—303; 林美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走私贸易的应对措施》，（台北）《史原》第18期，1991年6月；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走私活动与走私市镇》，（台北）“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1997年7月；拙著《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战更复杂，更困难。^①

在经济战中，学界重视货币战的程度要远远大于物资战。早在抗战期间，许多有识之士就指出：“通货战就是经济作战的核心……货币不但是交易和价格的标准，一切的经济生活都离不开它”^②，“货币战实为敌我经济战中之主力战”^③。近年也有学者指出，在现代战争中，经济战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军事热战或有长时间的中止，但财政经济的战争却在城镇乡村无远弗届地展开。在经济战中有货币金融战、贸易战、生产战、封锁与反封锁等等。而货币金融战又是现代经济战的核心。^④

在激烈的战争进行当中，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及现实的紧迫性，学界对中日经济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对策性的研究。早在1939年，即出版了两种同名的《中日货币战》，一种为国民出版社出版，系当时的报刊资料剪辑而成；另一种由独立出版社出版，马寅初、朱偰、高叔康、丁洪范、邹宗伊、潘应昌等著名经济学家执笔。1942年，河南三一出版社又出版了华而实的著作《五年来的中日货币战争》。

在抗日战争即将扩大为世界性的大战之际，学界对经济战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41年，新建设出版社出版了刘耀燊的《中日经济战》，他将中日经济战明确划分为中日货币战和物资争夺战；同年，杨寿标、简贯三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托，撰写了《论经济战》一书，分析了经济战的方式、策略、作用、意义及对策。

沦陷区的状况也是学界关心的问题。1941年，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了郑伯彬的《敌人我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对日寇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方式有简要的分析。国民政府在战时还有专门的沦陷区经济调查机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统特种经济调查处。该处成立于1939年7月，首任处长为陈介生，后由李超英接任。共有人员134名，其中留学生60名，本国专科以上人员64名，军、警校学生9名，中学毕业生1名，人员具有较高素质。该处每日编印经济情报，按月编印经济专报、经济汇报、参考资料等内部刊物，前后相接，具有

①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翻印，第85页。

② 谢光南：《论中日通货战争》，《中农月刊》第2卷第11期，1941年11月。

③ 中统特种经济调查处编印：《第六七年之倭寇经济侵略》，重庆1945年版，第25页。

④ 宋佩玉：《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较强的连贯性。^①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资料均为内部机密材料，非宣传品，且系实地调查得来，具有较大的真实性。他们将调查资料的精华部分编印成册，供有关部门参考，如《四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略》、《第六七年之倭寇经济侵略》就属此类。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该处处长李超英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上做了系列讲演，后结集为《伪组织政治经济概况》，由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

中共对战时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情况也极为关心，从1939年开始，以“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的名义编辑出版了《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情况资料》等书，所收集的材料是从抗战前到抗战三周年为止。材料的来源是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书籍、报纸和杂志。^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著作显著增多。如粟寄沧著有《中国战时经济问题研究》（中新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出版部1942年版），姜庆湘著有《中国战时经济教程》（科学书店1943年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编有《中国战时经济问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43年版）。姜著概述战时经济的重要性，分析中日双方战时的经济情况和中国战时经济的几个特性，并论述抗战以来的中国农村经济、工业、财政、金融、贸易、交通运输以及物价问题，指出中国战时经济的前途。《中国战时经济问题》讲述抗战时期中国的工矿、农林、财政、金融、贸易、交通、物价等问题，最后介绍了日本经济和金融侵略的情形。

财政评论社于1943至1944年出版了几种财政金融方面的著作，如朱偕《中国战时税制》（财政评论社1943年版）、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财政评论社1943年版）、童蒙正《中国战时外汇管理》（财政评论社1944年版）。朱著评述了大后方战时税制的变化，邹著内容包括战时金融管制的要务、战时金融恐慌的对策、战时金融机构的管制、战时货币筹码的管制、战时金银的管制、战时外汇的管制、战时国内汇兑的管制、战时银行信用的管理、国家银行业务的管理、省地方银行业务的管理、非常时期管理银行办法的施行、管理银行的加强、战时社会资金的管制及今后的收缩通货平抑物价问题、

① 《特种经济调查处组织经过及工作概况》（1940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财政部档案3②—2442。

② 赵长海：《延安时期的“时事问题丛书”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平衡预算紧缩发行问题、消化公债强迫储蓄问题、管理银行统制资金问题和管理物资统制物价问题。童著回顾了抗战发生后关于外汇的措施、管理外汇的机构、进出口外汇的管理、华侨汇款的管理、黄金白银的管理、借款易货的处理、英美封存资金、外汇黑市的取缔、中英美贸易付款办法。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许涤新出版了《现代中国经济教程》（光华书店1948年版），其中关于抗战时期经济的表述值得重视，即该书将战时经济划分为国统区经济、沦陷区经济和根据地经济进行叙述，一改先前各书的表述方式，成为此后经济史著作叙述战时经济模式的滥觞。

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抗战史研究处于冷冻的状态。除了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在1957年翻印了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几本书外，关于抗战时期经济方面的著作少得可怜，只有张雁深的《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三联书店1958年版）和寿进文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后来的研究者在重拾这段历史时，感觉已被遮掩在历史的迷雾中，正如戴建兵所指出的那样，经济战是抗日战争这场风云变幻的历史活剧中极为重要的一幕，但它的辉煌却被烽火硝烟和隆隆的炮声所掩盖。^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抗战史研究像其他研究一样，逐渐从寒冬中复苏过来。王洪峻出版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粮食价格》（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1988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经济战略措施研究》。该书第10章将对敌经济作战分为货币战和物资战。战时大后方税制也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中（匡球：《中国抗战时期税制概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1995年是抗战胜利50周年。在这一大庆的刺激下，伴随着政治气氛的宽松，抗战史研究呈井喷形势。1994年徐朝鉴即主编了《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适时推出了抗日战争史丛书，李平生的《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和戴建兵的《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都属于这套丛书。地处当年大后方的各省也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崔国华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韩渝辉主编的《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

^①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重庆出版社 1995 年版)。北京也出版了清庆瑞主编的《抗战时期的经济》(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从 1995 年左右开始,抗战史学界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动向,即沦陷区研究逐步得到重视。该年推出两部有分量的史料集: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华北沦陷区资料选编》(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中央档案馆等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日汪的清乡》(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此后有关沦陷区经济的著作增多,较重要的有:居之芬、张利民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王士花的《“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唐凌的《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吴景平等的《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尤其是第六章“国民政府与日伪之间在上海的金融战”、第七章“抗战时期上海的外汇市场”;黄美真主编的《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江沛的《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解学诗的《满铁与华北经济(193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王士花的《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姚会元的《日本对华金融掠夺研究(1931—1945)》,武汉出版社 2008 年版等。此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还出版了日本学者浅田乔二等的著作的译本《1937—1945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日本学者扎实的实证研究对中国学者既是借鉴,又是鞭策。

论述大后方经济的著作主要有:宋佩玉的《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张燕萍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动员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郑会欣的《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研究(1937—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年版。上海“孤岛”经济的研究著作则有张赛群的《上海“孤岛”贸易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6 年版。

关于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战,在货币战方面,除前引戴建兵著作外,尚有我国台湾学者林美莉的著作《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6 年版);在物资战方面,学界的研究集中在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

私方面^①，林美莉并用翔实的档案探讨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物资抢购活动。^②

二、经济战及其诸因素

（一）经济战

“‘经济战’这一名词在今日已成为极流行的术语”^③，确实，在抗日战争时期，“经济战”无疑是当时最常见、最时髦的名词之一。

当时的学者认为，“所谓战时的经济作战，乃指一国在战时对于经济上的参谋、调配、集中及攻守而言。其目的在保持自国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不致因遂行战争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状态的变动，以便支持长期大规模的战争；更进而利用本国的经济力量，寻觅对方的经济主力，一举击溃，使其遭到根本的覆灭，而确保战争的胜利”^④。或言之，“经济战乃是指利用一国的经济力，运用经济战略，消极的谋本国作战力的自保，积极的设法破坏敌对国之经济力之种种设施而言”^⑤。

近代战争的性质，绝不能超脱经济意义而加以独立的解释。战争虽然是政治的继续，但归根结蒂还是经济的产物。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自始至终是以经济掠夺为其根本目的的，为找寻、扩大与巩固其商品倾销与资本输出市场及原料产地而对外发动战争。因此，近代战争从本质上讲是经济战，而军事战、政治战仅是经济战的手段与外在表现而已。

战争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而战争本身需要经济力量来支持，

① 简笙簧：《抗战中期的走私问题（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台北）《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11期，1979年5月；Lloyd E. Eastman, “Facets of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Smuggling, Puppets, and Atrocities during the War, 1937—1945”, in Akira Iriye (ed.),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75—303；林美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走私贸易的应对措施》，（台北）《史原》第18期，1991年6月；林美莉：《抗战时期的走私活动与走私市镇》，（台北）“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1997年7月；唐凌：《抗战时期的特矿走私》，《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拙著《中日经济战中的走私活动（1937—1945）》，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肖自力：《民国时期钨砂走私现象探析》，《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连心豪：《水客走水——近代中国沿海的走私与反走私》，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林美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物资抢购》，《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军事组织与战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版，第275—310页。

③ 杨寿标、简贯三：《论经济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1年版，第2页。

④ 富蔚若：《从经济战的意义论如何突破封锁》，《陆军经理杂志》第5卷第5期，1943年，第36页。

⑤ 杨寿标、简贯三：《论经济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1年版，第4页。

所以战争是交战双方包括人力、物力与财力在内的经济力的总决斗。决定战争最终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除了战争性质这一起长远作用的根本因素以外，双方动员起来的经济力的强弱起很大作用。如果经济发生动摇，武力就在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依据，所以各国都重视经济战。为求击溃敌人，一方面要巩固自身的经济基础，发展己方的经济力量；另一方面要摧毁敌人的经济势力，同时更需抵抗及反击敌人的经济攻势并防止本身的物资为敌所用。国际间的经济关系，在平时就是有斗争性的，关税壁垒及近代的货币政策都是经济斗争的手段。一至战时，经济斗争的手段更加多样化、尖锐化。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普遍认为不单是军事失败，更重要的是经济斗争失败，乃至最后被迫屈服。这一惨痛教训，历来为此后交战各国引为深鉴。凡是交战国家，无不致全力于维持本国经济及击溃敌人经济。

经济战的范围，不仅针对生产部门（包括劳动力）和对外贸易，即财政金融和交通等亦包含在内。所以，经济战的方式也相当繁多，但大致可分为攻、守两个方面。在攻的方面，作战方式有：第一，经济破坏。在敌国或其占领地，对工厂、矿山、农场、船坞、仓库等进行炸毁破坏工作，以削弱敌方的军需生产力及粮食供应量。第二，窒息贸易，即经济封锁。严密海陆空封锁线，以断绝敌国对外贸易，使其供求失去平衡。同时在地战附近及港口广布查缉网，防止敌人通过内奸败类化零偷运。第三，破坏交通。将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如铁路、公路炸毁，追击空运、截击海运，破坏敌方军需运输及兵员调动。第四，扰乱金融。仿制敌国纸币，运入行使，破坏其货币信用，同时运用外交手段，透过同情己方的第三国封存敌国资金，以冻结其金融活动。第五，吸收敌资。除在占领地搜括一切资源外，并通过对方商人及第三国协助，将己方剩余的非军需物品向敌国倾销，吸收其货币或物资，使其准备金枯竭与物资外流。这些都是击溃敌国经济战的攻势战术。^①

经济战的守势战术，在于防止与反击敌方的经济攻势，或对已发现的敌方攻势采取的对策。与攻势作战相对应，其内容大致可分为：第一，加强生产。不仅将军需工业和农作物扩大生产规模，并尽量开发富藏与垦荒，限制若干不必要消耗品的制造，使能集中原料适应战时需求。第二，抢运物力。在沦陷区域，尽量撤出劳力与技术人员，使沦陷区工厂生产发生停滞。第三，繁荣农村。将工厂及物资转移到比较安全的乡村，一方面可避免敌机的空袭，另一方

^① 学海：《泛论敌我经济战》，《广东缉务》第2期，1942年8月1日。

面可就近采集原料，减轻因运输造成的消耗，而且可使集中于少数城市的游资失去投机作用。第四，维持运输。除编组押运队、护航队外，尤需多辟新交通线。第五，统制贸易。此举不仅统筹运销出口物品，以换取外汇或国外物资，并能藉此防御敌方利用中立国或奸商购夺原料及推销其非必需品。第六，巩固金融。战时金融统制实为战时经济统制的中心，防止敌方借销非必需品以获得己方货币，进而去外汇市场上套取外汇，是金融巩固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还可活跃国内贸易，阻碍游资的投机企图。以上是经济守势作战的几种方式。^①

人们认为，“对敌经济作战的重点有二：其一是货币战，其一是物资战”^②。具体来说，经济战的方式可分如下几种：第一，表现于通货方面的经济战，此即所谓通货战或金融战。第二，表现于贸易或关税政策方面之经济战。第三，表现于资源掠夺上的经济战。第四，表现于经济封锁上的经济战。^③就物资战和货币战的关系来看，“物资战与货币战是互为表里的，物资战是基础，货币战是表象”^④。就货币战和物资战的进程来看，中日经济战是以货币战开始，而归结到物资的争夺。中日经济战初期，敌人虽侧重于货币进攻，但并未放弃物资的掠夺。此后中日经济战，纵然还有货币的斗争存在，但其表里则不外物资的争夺。^⑤

（二）经济封锁与反封锁

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在战时格外为人所重视。所谓经济封锁，“即武装的经济制裁，在于防止敌国购买本国货物及他国货物，或售货于本国及他国。中立国代办敌国贸易，尤应注意防止，使敌国与外部经济上之关系完全断绝。它的目的：第一，使敌人所必须之军用物资无从运入，以减少其战争之能力；第二，使敌国之国内经济平衡发生破裂，使敌国人民生计困难”^⑥。由经济封锁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防止敌对国家利用走私增加实力的意味。其实，“经济封锁”作为一个国际公法承认的概念，产生于19世纪初叶的欧洲，但它不是

① 学海：《泛论敌我经济战》，《广东缉务》第2期，1942年8月1日。

② 许涤新：《战时经济政策的检讨》，《群众》第8卷第1、2期合刊，1943年9月16日，第9页。

③ 杨寿标、简贯三：《论经济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1年版，第5-7页。

④ 何汝津：《现阶段的敌我经济战》，《新阶段》第1卷第3、4期合刊，1942年7月15日。

⑤ 富蔚若：《中日经济战的新形势》，《陆军经理杂志》第7卷第2期，1944年，第32、33页。

⑥ 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3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41年版，第413页。

指战时封锁，而是指平时封锁，意即以封锁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由于它有助于避免用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因而获得国际上的认可。

江沛则引述了日伪方面对经济封锁的解释，“经济封锁政策原含二义，即对匪共而言，为实行封锁，勿使一丝一毫流入匪区，就我方即治安区域而言，为实行统制配给，使人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防止其浪费。为完成此两义，对敌匪实行封锁计，亟应多设检问所、检索班、屯粮仓库等，为治安区域实行统制配给计，亟应推广合作社，广招社员，使其普遍而确实推行，然后能安定民生，确保治安”。^①

限于国力，战时主要是日本封锁中国，“日本对中国施行海岸封锁，然后施行大陆封锁”^②。海岸封锁，亦被称为“外线封锁”，是利用其优越的海军，企图从黑水、白山，经由黄海、东海、南海，至海防、西贡、仰光，建立一个弧形的经济攻势。^③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曾指出，“沿海口岸经济的封锁为敌最后的手段，说到敌人对我国沿海实行经济封锁的作用，固然是在断绝我国和英法美的交通，以窒息我经济的命脉，使抗战无法进行”^④。

“所谓‘反封锁’，并非以若干海军舰队同样封锁敌人的海岸线，亦非用潜水艇击沉日商轮邮船，无可讳言我们是没有这些。”^⑤抗日战争是强国日本对弱国中国的侵略，中国海军力量薄弱，不能将经济封锁施行及于日本沿海，所以中国只能去战地与沦陷区边缘对日本的经济封锁攻势谋求打破。对于经济反封锁，国民政府最初的构想是，“敌方对我方施行经济侵略及经济封锁后，我方对策为加强组织经济的防御线，在敌区附近广布查缉网以包围敌人，对敌方之封锁或侵略之种种手段，分别予以击破，使敌方之经济活动无法伸张而至没落”^⑥。可见，此际国民政府对敌经济战的重心尚在于对无用敌货走私输入与有用物资走私输出的防止上，至于利用走私输入有用物资，则因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尚未提到公开讨论实施的日程上来。

① 《省长对三次治运期满总评》，《晋铎》新年号，1942年1月1日，转引自江沛：《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② 微庸：《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复兴旬刊》第20期，1939年，第5页。

③ 杨寿标、简贯三：《论经济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1年版，第44页。

④ 黄绍竑：《封锁与反封锁：加强对敌政治经济斗争》，《碧湖》第27号，1939年7月31日，第2页。

⑤ 微庸：《经济封锁与反封锁》，《复兴旬刊》第20期，1939年，第6页。

⑥ 顾翊群：《经济封锁》，《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第3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1941年版，第417页。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利用走私来抢购沦陷区物资才为社会舆论所广泛接受而成为共识。

第一，所谓反走私是政府有计划的、有组织的一种秘密走私活动。政府基于战时财政政策和经济的战术要求，为着有效地达成其胜利的目的起见，利用商民的爱国心，动员所有走私人员，有计划地加以组织，授以必要的技术训练，由政府贷予必要的资金，和给予军事上政治上的便利，使其运用走私的方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输出必要的物资和运入必要的器材物品，以巩固战时的经济。

第二，反走私运动是沦陷区民众和爱国商人，配合着游击部队抢救物资，向内地迁移和破坏不及迁移物资的一种政治、军事、经济综合性的斗争，其方式的运用，应是极机动和灵活的，如乘守军不备，施行迅速的偷运，或施以有力的武装突击，及必要时对伪军以种种贿赂或威迫，以求目的的实现。

第三，所谓走私是把可以赚钱的物品偷运出去，同时又把可以赚钱的东西偷运进来，这种活动在商业和运输的意义上说来，是和普通的营业一样，所不同的就是在技术上和时间、空间上的不同而已。

反走私工作与走私活动，虽具有同一手法与形式，但在内容上都其有根本不同的意义。换句话说，走私活动是基于商人自私自利的要求，商人为达到自私自利的满足，不惜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个人利益而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反走私工作，却基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的要求，商人在国家民族利益要求下，配合着个人利益，为个人和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冒险，其效力一定比较前者来得大而有效。^①

可见，走私与封锁实为同一种经济战术的两面而已。

^① 参见陈晚任：《对敌经济战中反走私的理论与实际》，《民族文化》创刊号，1941年4月30日，第82-83页。

第一章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对华经济战

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战，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太平洋战争前，在物资战方面，以1940年6月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为日本对中国大后方的走私倾销及物资诱购期，后一个时期是日本的出口封锁与入口诱购并行期。在金融战方面，日本在这一阶段的手法是诱使法币从大后方流入沦陷区，再用收集到的法币到上海的外汇市场上套取法币外汇基金。就物资战与货币战的关系来看，物资战是围绕货币战进行的。

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货币战，是日本企图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币制，进而摧毁中国经济而引发的。在货币战中，日军试图通过从货币市场上驱逐中国货币，争取有利于敌伪货币的比价，套取中国的外汇，抢夺中国的金银，并以伪造中国的货币等手段来达到彻底破坏中国货币的目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套取中国外汇已不可能，日本又以物资战的形式大打货币战，将法币推向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以抢购物资并加剧非沦陷区的通货膨胀。日本的这种一石三鸟的货币战略，尽管在货币战中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最终随着其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彻底终结。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的对华金融战

“中日经济战争中底最前哨和最剧烈的一环，就是货币战。”^① 为了更深刻地了解抗日战争中货币战在各个侧面的斗争和争夺形式，有学者分别从货币的阵地战、外汇战、金银战、假币战、物资战等五个方面加以分析。其中所谓货

^① 刘耀荣：《中日经济战》，广东新建设出版社1941年版，第13页。

币阵地战，就是力争以自己发行的货币占领流通市场，驱逐对手发行的货币，从而掌握使用自己货币区域的经济命脉。^① 其实前四项即是金融战的四种表现，与我们将中日经济战划分为金融战和物资战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日方对货币战的重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和军界的法西斯分子狂妄已极，他们妄图“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②。他们过于迷信武力的作用，认为凭借日军的“强大”战斗力，像中国这样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③的。他们甚至乐观地认为，“中国事变”在一个月內，最多在三个月內就能解决。后来虽未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日本仍然执迷不悟。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④

战争没有向日本预想的方向发展，未能速战速决，反而使日军深陷泥淖，其心情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自白，“日华不应该抗争而应该合作，这是先觉之士早就倡导的。不幸的是，中国事变同争取早日解决的努力相反，却变成了长期战争。大本营和政府的苦恼以及国民的焦虑心情逐渐达到难以掩饰的地步”^⑤。

由于迷信武力的作用，因而在战争最初的半年时间内，日本侧重于军事攻击，经济侵略的“谋略”尚不系统化。

不过，在这一时期，日本已初步提出了在金融上推翻中国政府的策略。1937年8月8日，日军制定了《华北事变处理纲要》，通过陆军省作为日本政府基础方案来统一思想，其中提出，“关于诱使华北各军阀、南京政府及金融界动摇等的经济及其他谋略工作，要与战局规模相策应同时并举”^⑥。1937年12月，日军制订《抗日政权溃灭策》，在经济上的策略是“使抗日政权在金融

① 戴建兵：《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207页。

② 〔日〕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2页。

③ 〔日〕今井武夫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④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第411页。

⑤ 〔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4页。

⑥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8页。